

# 晚清士林的香港观与思想嬗变

夏俊霞

**内容提要:** 英国强占香港后,一面不顾一切地掠夺香港,并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侵略和掠夺中国内地;一面又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发、建设香港。在香港人民的辛勤劳作下,香港迅速发展起来。不仅成了中外贸易的集散地,更成为展示西方近代文明的橱窗,成了西学、西艺、近代民主思想观念的风云寄汇之地,成为中国人窥见域外文明的窗口。作为第一批展示西方文明的通商口岸和第一批西学传播之中心,香港在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与开放而迅速变迁的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尤其是敏感于时势变迁的晚清士林如洪仁玕、王韬、何启、康有为、孙中山等人,每一个人思想新旧更新的旅程中,香港都是重要的一站。他们对香港的认识与思考,激发了思想上的巨大嬗变,化成了晚清社会中一次又一次不同凡响的呐喊,汇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时代思潮。

香港对晚清知识界的巨大影响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突破夷夷观念,接受西式教育,成为洋教信徒;潜研西学,倡导改良,西学东渐,西俗东渐;推翻专制王朝,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滥觞。

**关键词:** 晚清、知识分子、香港、影响

香港,边陲一隅的弹丸之地,对闭关锁国的清王朝来说,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可言;然而对于近代日益开放的世界格局,它的天然地理条件却具有明显的经济与政治意义。1841年,经过产业革命洗礼的英帝国占领了香港,1842年,又强迫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上签字,割让香港,从此就再也不肯离开。

英国殖民主义者一方面不顾一切地掠夺香港,并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侵略和掠夺中国广大内地,一方面又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发和建设香港。1849年,也就是《南京条约》签订后7年,香港被英帝国主义侵占后8年,一位道光朝的进士、湖南的名学者何绍基途经澳门、香港,对香港的街市、服饰、人口、语言、饮食等等的西化深为震慑,还以为到了外国,情不自禁地大发感慨:“一日澳门住,一日香港息。澳门半华夷,香港真外国。一层坡岭一层屋,街石磨平莹如玉。初更月出门尽闭,止许夷车奔驰逐。层楼叠阁金碧丽,服饰全非中土制。止为人人习重学,室宇车船等仪器。其人丑陋肩(月干)修,深目凸鼻鬚眉乱。言语侏离文字异,所嗜酒果兼羊牛。浙染中华仓圣学,同文福音资考诂”。<sup>①</sup>

香港的发展吸引了包括商人、传教士在内的大批外国人蜂拥而至,很快香港不仅成了中外贸易的集散地,更成为展示西方近代文明的橱窗,成了西学、西艺、近代民主思想观念的风云寄汇之地。香港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内地移民。人们来了,带着渴望与梦想,人们走了,带走了收获与感受。穿梭往来之间,或深或浅或浓或淡地打上了香港的印记,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香港的影响扩大到内地。于是,香港这个在众多中国人看来似乎是天涯海角的弹丸小岛,一下子变成了中国人窥探域外文明的窗口,一个可资效法、学习的样本,一个新时代的蓝图。作为第一批展示西方文明的通商口岸和第一批西学传播中心,香港在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与开放而迅速变迁的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尤其是那些不甘寂寞的智慧头脑,他们对香港的认识与思考,化成了晚清社会中一次又一次不同凡响的呐喊,汇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时代思潮。

当我们潜心于纷繁的史籍中,无不惊讶地发现中国近代史上各个重要时期杰出的人们都与香港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农民起义领袖洪仁玕到倡导改良的思想家王韬、何启,从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到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直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每一个人思想新旧更新的旅程中,香港都是重要的一站。香港对晚清士林的影响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 一、突破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接受西式教育，成为洋教信徒

中国人一向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华夏民族乃世界上最优等的民族。近代以来华夷观念成为中国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明的极大障碍，这在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天主教的认识上表现尤为强烈。而在香港接受过教会学校西洋教育或与传教士关系比较密切的一批知识分子，则较早地突破了这一迂腐观念，并进而悉心潜研西学西教，甚至受洗入教。敢于抛弃千百年来对祖宗神灵的敬拜而去相信蛮荒夷族的宗教，这在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说的确是极其难以接受的，如此的举动需要有惊世骇俗的勇气。在这批人中比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有袁德辉、梁发、何进善、容闳、黄宽、黄胜、洪秀全、洪仁玕、孙中山等人。

众所周知，当1807年第一个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达中国的时候，清政府闭关锁国，严禁外国人来内地，更不允许传教士进行宗教活动。因此，马礼逊等人只得将活动基地设在马六甲、新加坡等地，水路迢迢，极其不便。香港被英国占领后，传教士们接踵而至，各种各样的传教团体竞相建立，原设在马六甲等地的活动基地也陆续迁来，使香港成为当时中国教会最多、影响最大的地方。尤其是教会在香港所办的各类学校，对香港的近代教育颇多贡献。到1849年，英国圣公会在香港开办了第一所专门为中国学生开设的学校——圣保罗书院。

香港早期教育并不发达，学校多为中学，所授课程多以中英文、算术和其它自然科学常识为主。然1866年至1872年，麦当奴任香港总督期间，开始在学校里讲授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到1892年，香港学校中西式课程已有拉丁文、阅读、作文、听写、翻译、莎士比亚、算术、代数、欧几里得几何、三角、测量、常识、历史、地理等。例如，香港著名的皇仁书院的历史课考试中要求学生思考处死查理一世是否正确，解释詹姆士二世为何会丧失王位。地理课让学生比较俄国和法国政体的差异。作文课还要求学生以“对外贸易的好处”为题撰文发表见解。至二十世纪初，香港开始创办大学，对西式课程就更加重视和提高。香港西式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使得在那里学习的中国学生不仅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对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等有了多方面的了解，加上耳濡目染，很快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熏陶，思想观念也发生急速变化。接受基督教的人数越来越多。<sup>②</sup>

英华书院，这是香港迄今最悠久的学校，建立于1818年，初设于马六甲，1843年迁到香港。英华书院英文名为 *Anglo-Chinese College*，是一所传授现代教育知识的学校，同时沟通中西文化，培育中国传道人。在港期间，英华书院一度颇为兴盛。“校长往往对于他们（指学生——作者注）教以基督教问答，是已成功的。最初每星期日施行，后来则时时举行，大体中国之青年们在学校里读起来，都有了背诵（圣经……作者注）的习惯。因此，他们把问答书就作为当然的而加以熟记了。……这样一来，双重的重要目的，即在学校里教以基督教书类和教师与学生间，一日礼拜一回神，几乎同时都实现了”<sup>③</sup>中国最早的一批基督教传道人如屈昂、印刷工人何亚新（何进善之父）等人都与该校有密切关系；英华书院毕业生中于社会较有影响的是袁德辉（中国最早的翻译人才，曾在林则徐幕下任翻译）、梁发（第一个中国人传教士，他的儿子梁进德自幼即受洗入基督教，并与袁德辉同为林则徐幕下作翻译）、何进善、唐景星、何昆山、梁桂臣等人。何进善，广东人，毕业后被委为牧师，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最早接受基督教者之一，他是著名的早期改良主义的倡导人何启之父。

马礼逊学堂，1842年8月英国占领香港后，由澳门迁港。学校主要开设英文、地理、算术、中文等课程。在迁港之前，已招收中国学生黄胜、李刚、黄宽、周文等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是1841年入该校读书的，后随学校一起迁至香港。容闳入马礼逊学堂时，只有13岁，容闳入学前是一个度日艰难的流浪少年，是传教士把他送到学堂读书，因此他内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尤其是对学堂的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Rew. S. R. Brown*）非常敬佩，充满好感，并逐渐消除了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的害怕，接受了基督教。

香港中央书院毕业生早期改良主义者何启（1859—1914），香港爱国进步团体辅仁文社的成员杨衢云、谢缵泰（兴中会核心人物），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生孙中山、圣保罗书院毕业生伍廷芳等人皆是基督徒。

洪仁玕，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场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虽然没有在香港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但他接受基督教也与香港有着密切的关系。洪仁玕是拜上帝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太平天国起义时，他因未能与

洪秀全汇合,又遭清政府搜捕,而于1852年由洪氏族人教徒带到香港,结识外国传教士韩山明(Rev. Theodore Hamberg)。1853年,洪仁玕再度赴港,以教授外国人中文为生。1853年底,洪仁玕欲赴天京未果,又回到香港,从此一住就是5年。期间恰逢韩山明返港养病,于是洪仁玕得以寻访问学。也就是在香港的这段时间里他真正接受了基督教。在港的5年时间里,他一面教授传教士汉语,一面广泛阅读了各类西学著述,潜心研读基督教教义,还先后结识了20余名传教士,使他对基督教的理解也更为深刻,在西方传教士看来,“他的基督教教义的知识”,也“是非常渊博正确的”。<sup>④</sup>以后在他主持天国政务时,在改进和完善太平天国宗教典制仪式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一切佛教的丧礼和一般中国人的祭祀旧俗全都被严加禁止”,而婚礼“除了不用指环以外,其他一切仪式都跟英国礼拜堂中的婚礼无异”,“干王的基督教知识是完善的,都是英国基督教新教教堂所惯用的,许多太平天国的重要礼拜仪式都经过了改正”。经他改进的宗教典制仪式,基本上与基督教一致。其中婚丧礼仪等方面的基督教化,对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确有积极意义。<sup>⑤</sup>

在港的这段时间,西学西艺大大地开阔了洪仁玕的视野,激起了他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兴趣和认同,基督教教义又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基督教理论,他将两者互相对照,两相印证,再加上他在香港的切身体验和观察,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他的思想观念,使他不仅成为太平天国最具远见卓识的领袖之一,更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主张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少数先进中国人之一,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思想家。

## 二、潜研西学,倡导改良,西学东渐,西俗东渐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大炮震破了中国人长久以来天朝大国、华夷之别的迂腐观念,冲击了几个世纪闭关锁国、守旧落后的封建王朝,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人们开始正视所谓的劣等的蛮荒夷族,开始睁眼看世界、看西方、师夷之长技。特别是上海等最先开辟的通商口岸,逐渐成为西学之中心、传播西学的策源地。然而,香港在改变人们思想观念上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香港西式教育的普及引发了社会、宗教与日常生活的革命性的变革。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香港华人的女孩子可以去图书馆,和男孩子们一样读书、学习。男女授受不亲等旧观念早已被摒弃,华人年青人早就对旧式的伦理、教育、思想观念不屑一顾了”。<sup>⑥</sup>大凡在香港受过教育或到过香港的人多成为突破传统中国的中心观念、学习西方文明倡导改良的先锋。

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容闳的成长经历中,在香港的生活和经历具有不凡的影响。

容闳入马礼逊学堂时还是13岁的少年,等到从这里毕业时,已经是19岁的青年人了。在马礼逊学堂的6年里,他不仅学到了大量的知识,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眼界大开,思想上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容闳曾在《意想之纽约游》一文中,根据布朗老师的讲述,加之对香港的观察,全凭想象盛赞了纽约天堂般的生活,言语之中溢满无限憧憬。所以当1846年他的老师美国传教士布朗回国时打算带几名同学去美国进一步接受教育时,容闳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与容闳一道报名的还有黄胜、黄宽。出国留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新鲜事物,非一般人所能接受,容闳的母亲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儿子的这一决定。不过,容闳还是坚定地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沟通中美文化的先驱。容闳的这一决定不论是对他自己的人生旅程,还是对中国近代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不能不说是马礼逊学堂接受的6年教育及其寓港多年的生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香港的学习生活对容闳的两位相依为伴的同学黄胜和黄宽也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二黄比容闳更早地进入马礼逊学堂学习,所受的西学影响与容闳无异。所以1846年布朗回国时,他们也与容闳一样自告奋勇报名前往。不过,两年后,黄胜即因病回国,寓居香港。不久即入英华书院一面从事印刷出版工作,一面帮助该院院长传教士理雅格(James Legge)翻译中文著述。在王韬1862年来港之前,黄胜是理雅格的翻译工作最得力的助手。英华书院的出版工作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出版经验,这样,1860年,黄胜创办了(一说与伍廷芳合作)香港第一家中文报纸《中外新报》。报道新闻并译载英文报刊的消息和商业广告,大受欢迎,黄胜亦由此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中国报业的先驱。

黄胜对西学西艺早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乐于钻研洋枪、洋炮,他陆续翻译了不少炼铁、造模、

置炉、钻炮、验药等方面的外文著作。他赞成中国应当学习西方，支持洋务运动。他还曾撰文《火器略说》函呈洋务要员李鸿章和丁日昌。李鸿章后来在上海创办新式外语学堂广方言馆时，点名请黄胜前来执教。

黄宽也是马礼逊学堂的毕业生，在马礼逊学堂的学习和香港的数年生活，打开了他心中对西学的兴趣和渴求。他尤其对西医着迷，后来果然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西医，专门学习解剖学和病理学，并获得硕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毕业于英国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1857年回国后先寓居香港，后到广州等地行医。他曾首次作过难产手术，全部成功地作过3000多次膀胱结石手术，其精湛的医术令人叹服不已，容闳称赞他是“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后来美国传教士嘉约翰（John G. Kerr）在广州开办博济医局（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同时还创办了医学训练班。黄宽应邀前来讲解生理、解剖、外科学和临床学，该训练班嗣后发展为博济书院，孙中山曾就学于此。在近代中国医学史上，尤其是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黄宽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是在香港，洪仁玕，由一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乡村私塾教师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思想家、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农民起义领袖。在港的这4-5年的生活和学习，对西学的思索，再加上书本以外的切身体验和感受，使得洪仁玕对西方政教的认识远远地走在了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开眼看世界的人们的前面。他不再从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出发去评判近代西方文明，而是认识到了近代西方文明是一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新式文明。他的《资政新篇》和他主持太平天国政务时进行的各项改革，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他的这种走在时代前列的认识。

在《资政新篇》中，他热情地称赞英、美等国“技艺精巧，国法闳深”，高度评价欧美的民主制度，赞扬俄罗斯、日本等国努力学习西法而至富强。他坚持奉基督教为国教，力主设立“新闻馆”、“兴各省新闻官”、“兴乡官”等等以“收民心公议”。“昭法律，别善恶”，使“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

他主张效法西方，革除封建陋习。倡导对外开放，批判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认为在对外交往中不可使用“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他还毫不余力地批判清政的闭关锁国的国策是致使中国“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的罪魁祸首。

他的《资政新篇》虽然不太适应当时激烈战争中风雨飘摇的农民们的天国，但对于势必要从闭锁中走出来的近代中国确是不可多得的醒世之作。

何启（1859-1914），香港中央书院毕业生，中国近代史上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父亲何进善是香港英华书院毕业生。有一个思想开明、敢于突破华夷观念接受基督教的牧师父亲，再加上自幼寓港的生活经历，何启的思想中很自然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反对保守、闭锁、僵化，力倡西学、鼓吹改良。1887年后的十几年间，他大胆地在香港著名的《德臣西报》（即《中国邮报》）上发表多篇议论中国形势、针砭时弊、倡言改良的文章，认为“政者民之事”，“虽君主实是民主”，主张“行选举以同好恶，设议院以布公平”。后来他的同学胡礼垣将他这些政论文章译为中文，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是影响颇大的早期改良主义著作。后来他见清政府腐败至极，转而倡言革命，还曾协助孙中山筹划乙未广州起义，起草对外宣言。

王韬（1826-1897），近代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重要代表，曾在香港生活长达10年，无论对其思想形成还是学问积累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王韬是1863年岁暮左右因曾上书太平天国而被清政府通缉经由传教士的保护才得以逃到香港的，寓港期间他结识的也多为传教士。起初，他主要是帮助传教士们从事翻译工作，得到传教士们的特别赞许。1867年传教士理雅格回英国，邀王韬前往。在英国的两年，王韬眼界大开。回港后，王韬不再从事翻译工作，而是与黄胜等人一起创办了《循环日报》，他亲自担任主笔。每日政论文章，大多出自王韬之笔。在这段时间里他发表的多数政论文章，集中体现了他根据在香港的观察思考所形成的改良主义主张，后来他精选其中最具代表性者集成著名的《韬园文录外编》中的第12卷。

王韬对香港的历史非常感兴趣，对香港社会的观察也极其细微。还曾经旁敲故老，延访遗闻。后来他条分缕析将他的访寻、思考构集成《香港略论》一书。其中谈到当时香港的住房问题、香港华人生活状况、社会风俗及当时香港的赋税制度（参见《韬园文录外编》卷六），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香港的重要史料。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急需通晓西学的人才。这些在香港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人在洋务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洋务运动贡献卓著。同时，他们针砭时弊、倡言改良又为中国的思想界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他们所介绍的西学西艺又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推动着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革。

对一些未曾到过香港的知识分子,香港也同样对他们产生了开拓眼界、启发智识、传播西学的影响,这主要得力于香港早期报业的发展。例如 1853年,英华书院出版的定期刊物《遐迩贯珍》问世。该刊由传教士麦都思及理雅格等人负责编辑,实际事务如中文撰稿、英文翻译、报馆总务等均由中国学者黄胜经理。该刊每月销售约 2000余份,以沟通信息、促进中外联系为宗旨。内容包括科学、地理、政治、天文、历法、医学、商务、新闻和宗教等方面。具体内容有世界地理、中国地理、香港新闻、商业广告、省城杂报等。其中一些较有代表性的篇名如下:《西兴括论》《香港纪略》《地形论》《火轮机制略述》《西国通商溯源》《英国政治制度》《地球转而成昼夜论》《地质略论》《生物总论》《身体略论》《地理撮要》《英伦国史总略》《心理论》《英国贸易新例使国裕民饶论》《地理全志节录》《花旗国政治制度》等。其中《花旗国政治制度》一文,不但介绍美国总统选举制、立法、司法、行政、联邦及各州的组织,还将英美作了比较。《遐迩贯珍》每期出版 3000余册,售价 15文,远销内地各省,足见其销路还不错。上自总督巡抚,下至工商士庶,“靡不乐于披览”<sup>①</sup>。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曾将他妥为收藏的全套《遐迩贯珍》作为了解西学知识读物借给他知识界的朋友。

随香港社会的发展,西化程度越来越深,人们对封建礼俗也越来越加以摒弃,越来越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西学东渐带来西俗东渐。西方男女平等思潮和男女自由交往观念在香港越来越受欢迎,人们开始突破中国传统的封建的男女礼教之大防,男女同校,妇女放足,妇女参加社交活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与此相应的是旧式婚仪得到改造,文明婚礼开始滥觞。大红花轿被汽车代替,大闹洞房、索要彩礼等旧式婚礼被一扫而光,不少人还来到教堂,全盘西化的庆祝自己终身大事。二十世纪以来,又出现集体结婚这一婚俗变化中的大事。在香港最早举行集体婚礼的是香港中华青年会智育委员许地山和该会的林承芬、傅世柱、高锡威等人。他们在 1936年 2月 5日发表宣言,说明集体婚礼的起源和好处,抨击结婚铺张浪费的陋习。

香港人服饰的变化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更是出现了服饰变革的潮流。“即便是缠足的中国人,一般地说,也很踊跃地改换西式服装”<sup>②</sup>。这股潮流很快地被引入内地。

### 三、推翻专制王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滥觞

谈到推翻封建专制王朝、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必定使我们联想到一个伟大的名字—孙中山,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震撼世界的、推翻清政府腐朽统治的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然而研究孙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事业和思想,则不能不提到香港。香港既是他革命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他与革命同志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

1883年 11月,孙中山第一次到香港求学,这时十七岁。从此,孙中山先生在香港求学读书合计达七年半之久,先后就学香港拔萃书屋、中央书院、西医书院, 1892年从西医书院学成毕业。在香港的这段时间,正是他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期间他一方面刻苦学习医学,潜心研读了法国革命史、达尔文进化论等书籍;一方面悉心观察感受香港社会,反复思索,萌生并逐渐坚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中因在香港学习生活而接受西方文明和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确立革命思想的大有人在。如兴中会早期会员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他们是孙中山大学时期关系最为密切的至交好友,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大学时代结识的西医书院的创办人之一何启,辅仁文社的社长杨衢云,这些人既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又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有力支持者。

1923年 2月 20日,孙中山曾在香港大学发表讲演介绍他“于何时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时说:“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至如何得之,则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街市,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闾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在里中时竟须自作警察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器完好否。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其故安在?”是啊,其故安在?这是许多关心祖国命运的莅港青年所深思不已的巨大诘问。青年孙中山反复思索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研究结果,知香港政府官皆洁己奉公, (下转第 52页)

是攫取权力。美国前外交官戴维斯曾在《纽约时报杂志》上撰文指出：“均势战略是一种合算的战略，……它可以使较强的敌手的注意力至少部分地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另一个敌手身上。也许最令人满意的是，这种战略还使它的运用者在与任何一方讨价还价时处于有利的地位。”<sup>②</sup>这段话很大程度上合盘托出了尼克松政府均势外交的真谛

注：

- ① 参见时殷弘：《尼克松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 74页。
- ②③ (美) 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35 43 221页。
- ④ (美) 亨利·基辛格：《权力均衡才有国际和平》，见《编译参考》1991年第 4期。
- ⑤ (美) 亨利·基辛格：《美国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42页。
- ⑥⑦ “Cold War Patriot and Statesman: Richard M. Nixon”，Edited By Leon Friedman and William F. Levantrosser，Greenwood Press，1993，p. 192 p. 207.
- ⑧⑩⑪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时事出版社 1982年版，第 79 6 7页。
- ⑨ 前引《尼克松主义》第 99页，注 [27]
- ⑫ 李义虎：《均势演变与核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57页。
- ⑬⑭⑮ (美)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第 239 270 229—230页。
- ⑯ 前引《尼克松主义》，第 85页。
- ⑰ (美) 弗兰茨·舒尔曼：《中美关系：在价值和利益之间的抉择》，见《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 3期。
- ⑱ (英) 亨利·布兰登：《美国力量的收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4年版，第 238页。
- ⑲ 王辑思：《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大三角”》，见《美国研究》1992年第 2期。
- ⑳㉑ 《尼克松 1973年最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年版，第 5 12页。
- ㉒ 王逸舟：《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92—193页。
- ㉓ 刘金质、梁守德、杨淮生主编：《国际政治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 94页。
- ㉔ 俞正梁、颜声毅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纲（1945—1987）》，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年版，第 238页。

宋 鸥 吉林大学《史学集刊》编辑部编辑 长春市 130023

（上接第 36页）贪脏纳贿之事绝无仅有，次与中国情形正相反。盖中国官员以贪脏纳贿为常事，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sup>⑧</sup>不难看出，孙中山的这翻讲话中存在一些对香港片面的溢美之词，但也大体上反映了香港当时飞速发展的客观现实，也说明当时香港在他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深刻影响。

其实香港的巨大变化，不仅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感悟，早在几年前就已经令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难以忘怀了。1879年二十二岁的康有为漫游香港，感叹“览西人官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sup>⑨</sup>康有为若没有香港之行，能否有对夷狄观念的突破，能否有对西学西艺的认识，能否有日后《公车上书》的勇气和胆识，能否有戊戌维新变法中的振臂一呼？尚未可知。

康有为、孙中山这两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两位思想巨匠，维新、革命两种强国富民道路的领路人，不约而同地对香港发出如此慨叹，又由衷地肯定香港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深远意义，不能不使我们正视香港在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变迁中的重要地位。

注：

- ① 《历代名人入粤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450页。
- ②⑥⑨ *Present Day Impression of The Far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p529; p528; p528.
- ③ [日] 平冢益德：《近代中国教育文化史》第二章，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 4—5页。
- ④ 《杨笃信牧师给戴德曼牧师的报告》，《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 232页。
- ⑤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 251—258页，下册第 578页。
- ⑦ 《遐尔贯珍》，1856年第 5号。
- ⑧ 黎晋伟主编：《香港百年史》，南中编译出版社，1948年，第 117页。
- ⑩ 《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 115—116页。
- ⑪ 《戊戌变法》（四），第 115页。

夏俊霞 南开大学历史系讲师、博士生 天津市 300071